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书创作与欣赏 / 郜锦强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1110-468-4

I. 行... II. 郜... III. 行书—书法 IV. J292.1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358 号

行书创作与欣赏

郜锦强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98 发行部 0551-5107716	开本	710×1000 1/16
责任编辑	李梅	印张	10.8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250千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68-4

定价 26.00 元

部 锦 强

由于种种原因,甘肃的经济相对滞后。但自古以来,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相对发达……这里的人,都有收藏名人字画的传统习俗,直到现在,仍沿袭着这种传统。这里的人,以家里能挂上一两



涵，它的表达方式既直观，又抽象；既理性，又富有情感，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审美因素。书法理论家熊秉明先生称中国书法是“艺术核心中的核心”，也是从书法的高雅与抽象层面分析的。因此，它不像通俗文化那样为一般人所接受，要经过长期的艺术熏染与引导，努力营造欣赏氛围，培养欣赏情趣，逐步引领社会各阶层步入高雅文化欣赏的殿堂。在此过程中，培养大众欣赏书法艺术的能力，逐渐产生更高的欣赏需求，这种需求再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逐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正是当代书法艺术家们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其次，书法艺术家应了解人民群众的欣赏心理与欣赏习惯，从“下里巴人”开始，逐步走向“阳春白雪”。当前，共建和谐社会，共奔小康目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坚持“二为”方针，大量书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符合时代主旋律要求的书法内容和书体形式，在普及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有些书法家却没有顾及这一点，沉醉于书法的“象牙之塔”而不能自拔。试想，如果没有大众的参与和支持，我们的书法作品仅仅停留在书斋里和展板上，而不能源源不断地进入寻常百姓家，书法艺术发展的空间将永远是狭窄的。在书写内容上，我们要多取大众化的内容，不能总是重复那些“古典诗词”，也要写一些现、当代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如有可能，最好由书写者本人根据时代需要，创作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又针对性较强的文字内容进行书写，打动欣赏者，使之乐于接受。在书体的选择上，应尽量书写楷、行、隶等易识易读的书体，草、篆等书体则视欣赏者文化水平的高低而适当选用。

再次，要广泛开展书法艺术教育活动。中国书法之所以在日本、韩国等国家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书法教育工作开展得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书法热”虽然势张力强，但主要在 schools 外部发展，而没有广泛深入到教育系统内部去。有识之士已指



出,长此以往是没有后劲的。目前,高等学校的书法艺术教育正在稳步发展,广东省已率先在全省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其他不少省、市亦有欲动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书法艺术团体的书协及各类书法艺术研究机构,也有责任配合开展非学历性的书法艺术教育活动,再加上少年宫、老年书协、各级工会、群艺馆等“群雄并起”,持之以恒,必成普及之势。诚如是,则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必然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国际上,我们“书法大国”和“书法强国”的地位会更加巩固,只有到那时,我们的各类书法艺术机构和书法艺术家、书法艺术教育工作者,才算尽到了历史的责任。



目次

第一章 行书起源概述	(1)
第二章 行书名家简介	(8)
第三章 行书练习方法	(15)
第四章 行书创作原则	(21)
第五章 行书中堂创作与欣赏	(27)
第六章 行书条幅创作与欣赏	(64)
第七章 行书横幅创作与欣赏	(80)
第八章 行书斗方创作与欣赏	(96)
第九章 行书对联创作与欣赏	(110)
第十章 行书扇面创作与欣赏	(122)
第十一章 行书牌匾创作与欣赏	(134)
第十二章 行书赠言创作与欣赏	(146)
代跋:浓浓师生翰墨情	(164)
参考文献	(168)



第一章 行书起源概述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偏于楷书者,称为“行楷”;偏于草书者,称为“行草”。与楷书相比,行书写得快捷,书写效率高;与草书相比,行书容易辨认,具有较强的普及性。同时,行书结体妍雅,运笔流畅,章法灵活,又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历来为文人雅士和人民群众所喜爱。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何学森先生的《行书津梁》一书也指出:“行书自产生起,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因为无论从实用还是艺术的角度,它都是极有适应性、极有魅力的。”“纵观漫长的书史,篆书、隶书、楷书的发展都存在盛衰的变化,而行书则长盛不衰,始终是书法领域之‘显学’”。因此,作为书法爱好者,应当学好行书的书写与创作。

那么,行书起源于何时呢?关于这一问题,书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现举几例如下。

王学仲先生在其《书法举要》一书中说:

“行书是后汉时期民间流行起来的新兴字体,这种字体适应于行文起稿时的简便迅速,当时的章草虽简便但多隶书波势,今草也识别困难,因而行书产生了。”

这种说法可称为“东汉起源说”。

何学森先生在其《行书津梁》中说:

“结合日益众多的出土资料去考察,可以确定行书大体产生于

这种说法可称为“汉魏起源说”。

这种说法可称为“西汉东汉交界起源说”。

以上几种说法,大都是把成型的“行书”书体出现,作为“行书起源”的标志。其实并不是这样。“行书”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不是某一年突然冒出来的。应该是逐渐出现,而不是“突然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培贵先生在其《行书教程》中的说法比较科学:

这种说法可称为“逐渐形成说”。

逐渐形成的说法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叶先生没有把行书萌发的时间作进一步考证。和前几种说法一样，虽都有各自的依据，但总体上说，都是把眼光聚集在“行书书体”的最终形成上，而忽略了“行书”还是一种书写方法。作为一种书写方法和书写方式，“行书”的起源则应当更早。因为“行书”书体是在“行书”的书写方式出现后，才由这种“写法”逐步探索而出的新的书体。

据史料记载,文字最初的形态,起源于距今 6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这种符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我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碎片,记载的是距今 3600 多年前的盘庚时期的文字。据考察分析,在甲骨文的刻写上,已有生硬与娴熟之分,规整与潦草之别。毫无疑问,技术娴熟,刻迹潦草,势必会使刻写速度加快。可见,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快速书写”的愿望和“快写”的实践。但这种愿望和实践,还仅仅是初步的,稚拙的。到了距今 2000 多年前的秦代,由于社会



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交往也日益频繁,从而对文字书写的需求量加大,因此对书写速度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出现了文字的“快写”现象。这种“快写”现象只是相对于规整的书写而言,尚未达到重新组合字体、改变结构、简化笔画的“草书”那样快的程度,因而我们姑且称之为“行写”。“行写”法的出现,提高了文字书写的速度,同时使文字的文本形态有了“行书”的意趣。

据乔柏梁先生所著《中国历代碑帖赏析手册》介绍,《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中就充分体现了“快写”的愿望和“行写”的痕迹(如图1-1)。该书分析道: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是刻在诏版上的文字,不同于出现在同一时期石上的标准小篆体,缺少那种绝对的整齐,绝对的圆匀,绝对的对称,而是由圆形变成方形,曲笔变成折笔,同时这种文字刻写随意,不加雕饰,结构疏密斜正不一,充分体现了运笔走刀的潇洒自然,在每一个单字和整篇的结构上都显露出一一种天真烂漫的形态,这种书写法大概就是秦朝的‘公文体’”。



图 1-1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



图 1-2 峰山刻石

这种“公文体”式的书写方式,实际上就是对“正体”的“行写”,它与整齐规范的《峯山刻石》(图 1-2)和《泰山刻石》(图 1-3)有着明显的区别。

再如秦《二世元年诏》的书写则更加活泼多姿，具有更多的“行写因素”(图1-4)。王镛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简史》一书对此分析道：

（秦二世元年诏）“急就而成，虽风格各异，但总体上奇肆多姿，天真烂漫，字字不作正局，大小形态不拘，与秦皇刻石的对称、规范化的庄重典雅完全不同。”

所谓“完全不同”，就是其中体现了强烈的“快写”的愿望和“行写”的因素。

由于毛笔的出现,简、帛的运用,秦代“行写”的现象日益普遍,如出土于云梦睡虎地的秦简《效律简》和《秦律十八种简》(图 1-5),显示出更加明显的行写因素。其中“曰”、“问”、“弗”、“司”、“八”、



图 1-3 泰山刻石



图 1-4 秦二世元年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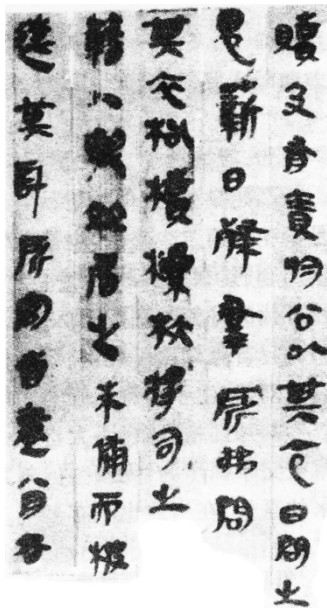


图 1-5 秦律十八种简



“月”、“而”等已经具有明显的行书意趣。从中可以看出,一是书写速度快,二是书写技巧娴熟,三是文字结体随意灵活,四是线条流畅、动感明显。整体看去,有很强的跳跃性。而这些,正是后世行书书体的基本特征。这说明,随着“行写法”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日益迫切,加上书写条件的改善,在秦代,行书书体的幼芽已经萌发了。

秦朝灭亡后,汉代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随着连年战争的结束,社会日趋安定,人民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文景之治”之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升平气象。大汉王朝地域辽阔,百姓殷实,社会交往频繁,对文字书写的美观与速度方面均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经过 1000 多年的发展,文字自身的结体规律逐步被人们认识,加上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专门从事书写工作的人群不断增多,大大提高了驾驭文字书写技术的能力,使长期以来人们“快写”的愿望得以逐步实现。在书写实践中,人们追求“快”、追求“美”、追求“便捷”,于是文字逐渐由篆到隶,“行书”书体的雏形便慢慢流行起来。如 1972 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简,为西汉文、景时期的文字,已出现明显的“草体化”倾向(见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51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这里说的“草体化”倾向,其实就是“行书”气象。再如西汉成帝时期的《王杖诏书令册》竹简(图 1-6)上的文字,不少已颇具行书形态了。如其中的“以”、“人”、“伤”、“毋”、“告”、“初”等,似乎已有现代行书的影子。整体考察,其运笔流畅,笔势往来已有明显的照应,甚至有“笔断意连”的感觉。至此,可以说“行书”已由书写方式转变为书体了。而汉宣帝时的《元康四年简》和元帝时的《永光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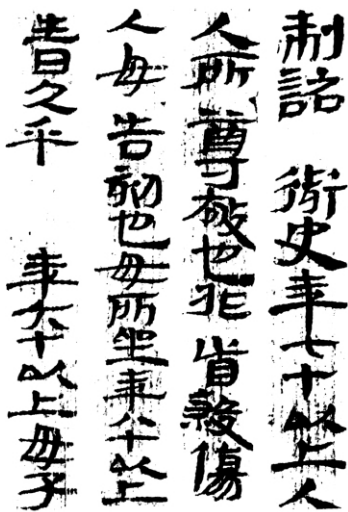


图 1-6 汉简《王杖诏书令册》



简》，以及新莽时期《王俊幕府档案简》中的部分文字都显示出行书书体日益成熟的气象。而作于东汉元和二年左右的《公羊传砖》上的文字(图 1-7)和东汉《熹平元年陶瓶》上的文字(图 1-8)，与现代意义上的“行书”书体相比，除个别地方尚有汉简隶意之外，已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了。也就是说，至东汉末年，“行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书体，已经基本定型了。

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则说：“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刘德升是东汉末年桓灵时期的颍川人。从上引文字书写方式与形态的发展来看，像刘德升这样能开门授徒的书家，在文字字体发



图 1-7 东汉《公羊传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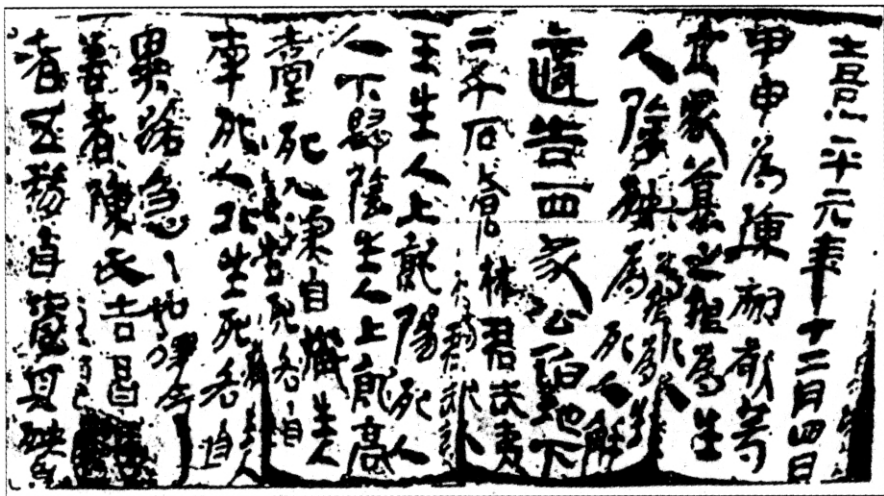


图 1-8 东汉《熹平元年陶瓶》



展的过程中,做些整理、规范乃至改造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说“行书”是他一人所造,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说法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如前文所述,在文字一开始出现时,人们在实践中就有“快写”的愿望,在“快写”的过程中,文字的结体方法逐渐演变,由篆而隶,由隶而草(行),逐步形成了定型的行书书体。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也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的需求下逐步改造的,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将某种书体的产生归结为一人所创造,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行书”作为书写方式,从文字的书写开始就存在了,只不过那时人们虽有“快写”的愿望,但由于条件限制还没有达到完全“快写”的目标。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快写”的愿望便逐步实现,才出现了秦代的“行写”现象和初步的“行书”形态,如《秦律十八种简》等。到了西汉,简、帛、毛笔的大量使用,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行书”书体的形成。东汉时期则是行书书体基本定型的阶段。到了这时,出现了像刘德升这样的书家,承担起了整理、规范行书书体和传授书写方法的历史责任。正因为如此,也才使得唐代张怀瓘产生“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的误解。这种误解一直影响到现代。行书“汉魏起源说”、“东汉起源说”,甚至还有“魏晋起源说”等,大约都与此影响有关。当然,刘德升等书家对行书进行整理的历史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正是这一时期对行书书体的整理和规范,为魏晋及其以后行书多姿多彩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生于西晋末年,主要生活于东晋时期,曾官至右军将军,故后人常称其“王右军”。他出身于著名的王氏世家,祖籍山东琅玕,即今山东临沂。西晋末年南迁以后,定居在会稽之山阴,即今浙江绍兴。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七岁时即擅书名,曾拜卫夫人(卫铄)学习书法。后来他渡江北游时,发现了历史上诸多名人书迹,尤其见到钟繇、蔡邕、张昶等人的书法,赞叹不已,由于他博采众长,方写出了旷世杰作《兰亭序》。



《兰亭序》无论是内容还是书法艺术,均堪称杰作,尤其是书法艺术,至今仍被奉为“神品”。《兰亭序》的书法艺术,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平淡自然,高雅妍美。古人曾赞之以“姿媚”,媚者,美也。《兰亭序》全文共 28 行,324 字。书写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 353 年。当时东晋王朝经过 20 来年的休养生息,政权已趋稳定,所在之江南虽不及往日中原之繁华,却也是形胜富庶之区。百姓殷实,社会安定,大有歌舞升平之势。在这一年的暮春三月,王羲之同家人子侄及亲朋好友,游春观光,以消不祥之气,时称“修禊”。在茂林修竹之间,山水环绕之处,又值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得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兴致勃勃,饮酒作诗,曲水流觞。是为历史上有名的“兰亭雅集”。所作诗歌乃编为一集,名为《兰亭集》,王羲之的《兰亭序》即是为此诗集作的一篇序言。其文章内容由大自然美好的景观,想到人生苦短,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想到人生的快乐与痛苦,生与死等等,感慨人生虽世殊事异,但“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感叹“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样一篇由景抒情、由情发论的短文,王羲之在饮酒至微醺之后,拿起鼠须毛笔,一挥而就。整篇看去,从容自如,多彩多姿,变化无穷。仅其中的“之”字就有 20 个,但个个不同。整篇布局自然天成,如行云流水,无一处做作,但又处处精严,形神兼备。仿佛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评论说:“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可以说,《兰亭序》在章法、结体、运笔等多方面的艺术,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实不为过(图 2-1)。

《兰亭序》释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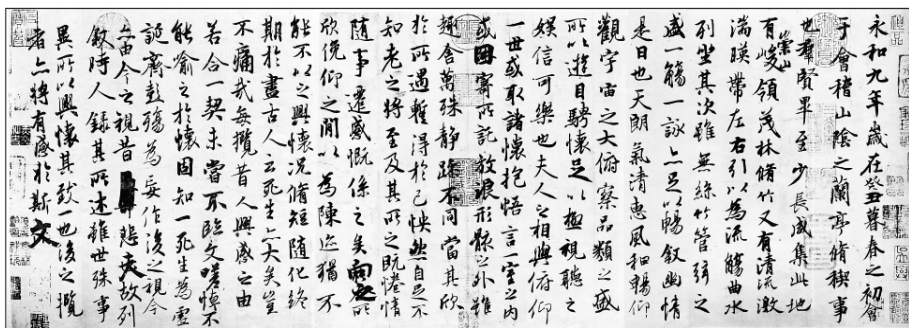


图 2-1 《兰亭序》

在书法史上，可与王羲之齐名的是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并称“二王”。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的行书加强了连笔，纵情书写，其线条流畅飞动，恣肆豪迈。其传世墨迹行书《鸭头丸》，可视为王献之的行书代表作，共 2 行 15 个字，现存上海博物馆。唐代张怀瓘在《书议》中评论王献之的行书“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唐代是书法繁荣发展的时期。在行书方面，著名的书法家有李邕、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其中，李邕的书法，开创了唐代书法的新气象。他的行书，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上，吸取魏碑的意趣，笔法强劲，线条奇崛，顿挫起伏，气韵豪爽，风格劲峭。代表作有《晴热帖》、《李思训碑》等。

颜真卿的行书结体俊秀，笔法圆润，线条浑厚，粗壮遒劲，点画



苍劲奇绝,字势豪健生动,形成一种浑强挺秀的风格。是唐代行书最著名的代表。

颜真卿(公元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其祖籍为山东琅玕,即今山东临沂。颜真卿自幼热爱书法,曾因买不起纸笔,以“黄土扫墙习学书字”。中举为官以后,曾慕当时的“草圣”张旭之名,拜其为师学习书法。“安史之乱”时,他为平原太守,故史称其为“颜平原”。为平安禄山叛乱,颜真卿与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联合抗敌,后常山被敌所围,由于粮尽援绝,颜杲卿及其子颜季明均被敌所害。战事结束后,颜真卿派另一侄儿颜泉明前去寻找尸骨,结果杲卿失去一足,而季明仅得其首。面对兄、侄遇害的惨烈之状,颜真卿怀着极其悲痛和义愤的心情,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不朽杰作《祭侄文稿》,又称《祭侄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图2-2)。

《祭侄稿》从叙述个人身份和追记其侄季明往事开始,想到“逆贼”作乱,常山郡终为敌兵所陷,而“贼臣不救”,终致“孤城围逼,父陷子死”的悲壮结局!尤其看到兄、侄尸骨不全,更是义愤填膺,写出“抚念摧切,震悼心颜”,两次又悲又怒地感叹“呜呼哀哉”!全文集惋惜、悲痛以及对见死不救的“贼臣”的愤激和对敌人的痛恨之情于一炉,百感交集,愤而迸发,终成千古绝唱。由于书写这样特定的内容,加上颜真卿特有的书法艺术,《祭侄稿》写得大气磅礴,雄强苍茫,无计工拙而酣畅淋漓,悲愤激越之情,跃然纸上。全文用笔古朴、浑厚,笔画粗壮,偶出方笔,力度彰显。运笔过程中任意挥洒,无意于工巧,笔随情走,情由笔宣,书写内容与书法艺术高度一致,显示出颜真卿高超的书法艺术与深厚的笔墨功力。是情与艺,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

《祭侄稿》释文: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曰:惟尔挺生,